

日据时期大陆台湾研究状况述评

褚静涛

内容提要 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,推行殖民统治,引起大陆地方人士及爱国知识分子的关注,他们设法赴台,了解台湾近代化的进程,俾益于地方建设。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,在台北设领事馆,海峡两岸的交流得以加强,大陆有关方面拓展了对日据下台湾社会的研究,特别是福建省政府对台湾的大规模考察,获得丰富的感性认知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围绕收复台湾,国民政府成立台调会,加强对台湾的研究,翻译、编辑出版多种资料,制订接收计划,为中国于1945年10月收复台湾做了必要的准备。

关键词 日据时期 大陆 台湾研究

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,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侵略者。在日据台湾的50年里,祖国大陆人民并没有忘记遭受日寇蹂躏的台湾同胞,尽己所能,展开对台湾情况的介绍与研究,为中国最终收复台湾做了必要的准备。笔者查阅了一些图书、报刊资料,试图对日据时期大陆台湾研究状况作一述评。挂一漏万之处,尚祈批评指正。

一 大陆对日据下台湾研究的草创(1895- 1927)

20世纪初,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许多杂志,介绍西方的新知识,鼓吹资产阶级革命。他们利用在日本的有利条件,开始关注台湾问题,如《浙江潮》经常刊发介绍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

湾的文章,《江苏》杂志发表关于“台湾三百年史”的文章。1903年,爱国志士通过实地游历,在《游学译编》上撰《台湾纪略》一文,对日据下的台湾情况作了初步介绍,并指出:通过现在的努力,“务使中国土地不以尺寸与人,则十年百年以后,举中国而恢复台湾焉可也”。这代表了那时中国进步人士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。

在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下,台湾的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。民国初年,大陆的地方政府为了取鉴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,多次派人赴台考察。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做了可贵的尝试。1915年,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校长何缙带学生渡台旅行,返闽后由邱文鸾、刘范徽、谢鸣珂撰写《台湾修学旅行报告书》,介绍台湾的农林建设。不久,江苏省长官公署委派王树榛为首的江苏省赴台参观团,考察台湾的劝业共进会、总督府、行政区划、财政、交通、农业等。返回南京后,王树榛撰《参观台湾劝业共进会报告书》,详述赴台的过程,比较了日本治台与清朝治台的得失。

1916年4月,汪洋奉福建巡按使委任,赴台湾参观劝业共进会,周游全岛,历时17天,“考察其政治风俗及拓殖之程序,复搜罗其最近之统计,归而作《台湾视察报告书》”。该报告凡29章及附录,图片60余幅,6万字,涉及日据下台湾的土地、林野、行政区划、气候、户口、教育、司法警察、农产(附移民)、工业矿产、金融贸易、邮政、电报电话、交通、卫生等。由于作者根据亲身考察及台湾总督府公布的大量统计资料编写而成,内容翔实,立论公允,为研究日据台湾20年来大陆的第一部专著。作者痛叹:“予谓日人治台,其他政策不足畏,此(指教育日语等)则根本政策,再二十年以

见《游台纪略》,秦孝仪、张瑞成编: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一集《国父孙先生与台湾》,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,第23页。

后,无人知历史所从来矣。”

1919年,大陆一青年学子辗转台湾留学,适逢连横撰写的《台湾通史》出版,通读之后,有感于:“自从日本割了台湾后,一字也没有再讲了(指1895年11月以后)……以我看来,这三十年来台湾史,比较从前更加重要得很(过去尚有台湾府志……等等)。不信,将来只有日本殖民发达史而已……台湾的历史,全在我们汉民族的责任呵。不是掠夺者会替我们做的。”他通过实地调查、访问,“得亲近了台湾的老前辈多人,藉知道台湾革命的状况”,并在台湾某图书馆里,找得很多革命党的证据,例如余清芳的谕告文、罗福星之宣言书及自叙传等。回到南京后,他根据收集到的材料,于1925年写成《台湾革命史》,“这本小册子是叙述台湾近三十年(1895-1925)的革命伟业”,凡19章,3万字,描述了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,分为“初期革命”和“中期革命”,包括林大北、刘德杓、陈发、詹阿瑞、蔡清琳、刘乾、黄朝、陈阿荣、罗福星、张火炉、李阿齐、赖来、罗阿头、余清芳等人的革命事迹;“最近的革命运动”涉及政治、思想、读书、家庭、文学、妇女、国语、宗教、文字、道德等层面,评述了1919年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、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,特别是大陆的五四运动对台胞的影响,坚信“台湾革命未来的成功”。该书是大陆第一部研究日据台湾近30年来岛内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专著,对大陆民众了解台胞的革命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在南京暨南学校求学的长沙学子袁克吾,通过与海外侨生的联系,得悉台湾的近况,遂有志研究日据下的台湾。毕业后,他设法赴台,问禁采俗,旁览日人专著,广为搜讨,穷数载之力,于1925年

汪洋著:《台湾》,中华书局1917年版,第188页。

汉人编著:《台湾革命史》,新民书局1925年版,第114页。

在南京编写成《台湾》，凡 3 编，计 16 章，及有关台湾总督府等照片 14 幅，约 12 万字。第一编涉及台湾的历史、地理、人口；第二编着重阐述了日据下的台湾政治，涉及中央行政、地方行政、法制、警察、财政、教育、宗教、交通、实业、金融、少数民族等；第三编为结论，其中有语：“吾人试平心思之，以我国今日之景象，反映台湾，立见日本对于台湾之政治，不论其为精神，为物质，皆有积极充分之计划……至今日我民族不能愤发有为者，即缺乏热心与毅力也。欲救此弊，端赖教育。”作者根据台湾总督府大量统计资料编撰而成，侧重探讨日据下台湾社会的诸多层面，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，代表了当时大陆对台湾研究的水平。故该专著甫问世，即引起大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。

清朝末年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中国社会动荡不安，执政当局根本无暇顾及日据下的台胞的安危。在与日本接触的过程中，一些地方人士得悉台湾经济发展较快，为了取鉴其中的经验教训，他们自发通过民间渠道，设法赴岛内参观考察，耳闻目睹，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，开始对日据下的台湾进行介绍与研究，出版几部专著，取得初步的成果。一些爱国学子，十分关心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胞，他们辗转赴台，探讨日据下的台湾社会、政治、经济等情况，宣传台胞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事迹。囿于条件的限制，这些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，但毕竟有助于大陆各界对日据下台湾社会的了解与重视。

二 大陆对日据下台湾研究的拓展(1928- 1937)

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，为处理大陆劳工赴台及两岸贸

易往来等问题,与日本协商,决定在台北设置领事馆,于1931年4月成立。当国民政府派驻台湾的第一任总领事林绍南抵达台北时,受到台胞热烈欢迎。1934年驻横滨总领事林彝民、副领事张振津,调任驻台。至1938年2月,台北领事馆关闭。台北领事馆努力搜集台湾总督府的调查资料和统计数字,并予以分析研究,如《台湾保甲诸法规》《昭和八年台湾贸易之回顾》《最近台湾对华南贸易概况》《台湾红茶大发展之新纪录》《去年台湾茶输出概况》《台湾十年来实施酒专卖制度》《日关税改正与台湾贸易品新旧税率比较观》等,刊登在《外交部公报》上,对大陆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日据下的台湾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在国民党内有“日本通”之称的陈仪,于1934年受命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。他有感于福建经济的凋弊,渴望取鉴日本治台的经验与方法。在他的促成下,由福建省建设厅厅长陈体诚带队的“考察台湾实业团”于1934年11月13日至28日,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考察,返闽后编成《台湾考察报告》,约22万字。陈仪作序,指出:“此次组织台湾考察团,派赴台湾考察,即欲输入关于各种建设上之知识,藉为闽省建设之考镜也。查台湾产业发达之历史,虽为时不久,然其发展之过程如何,所用之方法与所采之步骤如何,举足为闽省振兴产业之参考,此就纵的关系言之,有考察台湾产业之必要,一也。闽省与台湾仅隔一衣带水,自然之环境既同,所生之物产无异,自气候地质以至农林渔牧殆无一不同,台湾前此所用以经营各种产业之方法,在足为吾人考证之资料,此就横的关系言之,有考察台湾产业之必要,二也……分二十一章,举凡米稻、甘蔗、制糖、园艺、茶叶、林业、水利、农林机关、渔牧、电气事业、铁道、专卖、

台湾新生报社编:《台湾年鉴》,台湾新生报社1947年版,第91页。

土地整理、财政、警政、教育、卫生，以及麻疯病治疗、鸦片专卖等。”考察团一致认为，台湾总督府的高度集权颇值得大陆各省借鉴：“台湾总督府除军权外，有统治全岛之权，一切法令虽经其内地政府敕令公布，但均系因地制宜，由总督府拟订者。高等法院亦隶于总督之下，故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权并不分立，政治上之运用如手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（注：此处请与吾国各省之情形互相比较）……此种制度，虽难尽适用于吾国各省，而在一岛之内事权之统一，职责之分明，则非吾国各省所能望其项背也。”1935年10月，南京国民政府派陈仪“以视察名义进行地方外交”，率代表团赴台，在日据台40周年大会上“观礼”。陈仪赴台后参观了日月潭水力发电所、嘉南大圳、港湾设备及矿山、制糖工厂、大学、气象台等，获赠《台湾法令汇编》。日本台湾总督府的组织形式和行政效率，给陈仪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日本在台湾推行鸦片专卖政策，据称效果颇佳，在大陆禁毒人士中引起争议。中华国民拒毒会指出，“自主张鸦片公卖之徒，鼓动簧舌，颠倒是非，政府乃派人赴台湾查公卖之制度，拟图仿效。本会反对最烈，惟对于台湾烟禁之材料，颇感缺乏”，乃派黄嘉惠“赴台湾实地调查，以明真相，嗣为对方诬陷，中途折回”。黄嘉惠根据收集到的有关材料，编著《台湾烟禁一瞥》，叙述日据下的鸦片政策、渐禁政策的采用与罪恶、新旧鸦片政策的比较介绍、新特许问题研究、反对新特许运动、附录，约2万字，揭露了台湾鸦片专卖的弊害，及日人狼心之阴毒，颇堪发人猛省。

陈体诚等著：《台湾考察报告》，福建省建设厅，第1-2页。

同上，第24页。

钱履周：《陈仪主闽事略》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：《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32页。

黄嘉惠编著：《台湾烟禁一瞥》，中华国民拒毒会1932年版，第1页。

林惠祥越海而东, 亲历台北, 取阅书志图纪, 复跋涉穷荒, 采集标本, 摄影留说, 编著成《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》一书, 分“番情概说”、“标本图说”、“游踪记要”三篇, 并附人物、风景、习战、跳舞等图。

日本占据台湾后, 即展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, 并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。大陆学者对日本台湾研究状况作了介绍。杨开渠翻译了日本人坂口著的《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》, 该书分5章, 包括台湾之领有、资本主义化、教育、政治、民族运动, 约8万字。叙述日据30年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, 对日治下的殖民政策、政治发展、经济、土地、度量衡、资本家的企业、财政与资本主义化、阶级的关系、台在日本帝国主义中之地位、殖民地借贷关系作了相当详尽的探讨。

大陆各界对日据下的台湾情况比较注意, 许多报刊杂志都刊载有关台湾方面的文章, 涉及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及经济的各个领域。《边疆半月刊》等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台湾的文章, 如1937年第1期发表了谢衣苓的《最近台湾经济及交通情况》一文, 介绍了贸易发展、专卖、运输等。第2期发表了由佐佐木静吾著、朱孝曾译的《台湾一瞥》, 作者将库页岛与台湾相比, 强调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重要性。译者指出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同化政策的恶毒性。还有, 1929年《农声》发表了侯过的《台湾产业视察报告》, 1931年《国际贸易导报》发表了《日本改良台湾糖业生产之锐进》, 《新亚细亚》杂志发表了方保汉翻译的《日本南进政策下之台湾》, 1932年《工商半月刊》发表了《台湾茶叶之过去与现在》, 1934年《女声》杂志发表了李文清翻译的《台湾女工的生活》, 1935年《中国农村》发表

林惠祥编著:《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》,台北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三号。

杨开渠译:《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》(日本人坂口著),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。

了李元明翻译的《台湾农家负债之分析》，《东方杂志》发表了市隐的《台湾大地震》，1936年《申报周刊》发表了陈北溟的《台湾的准备与华南》，等等，不下100余篇。

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，委屈求全，设立台北领事馆，虽出于经济上的目的，因此得以及时获取大量第一手的台湾总督府的资料，而能及时掌握岛内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各方面的情况。陈仪等人为了发展地方经济，对台湾进行了大规模、多门类的经济考察，获得了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感性认知。大陆对日据下台湾研究的领域与内容都有了相当大的拓展，如对台湾禁毒的研究、高山族生活习惯的调查，都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。这反映了台湾问题备受祖国大陆同胞的关注。

三 围绕收复台湾展开的研究(1938- 1945)

1937年7月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1938年4月1日，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表态，“台湾是中国的领土……必须针对着日本之积极侵略的阴谋，以解放高丽、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”。这极大鼓舞了台胞的抗日激情，纷纷辗转回到大陆组织团体参加抗战。1941年12月8日，珍珠港事件爆发。次日，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，向中外宣告“所有一切条约、

陈汉光：《开罗会议后重庆出版台湾图书汇目（附：光复前内地杂志刊载台湾文献辑目）》，李汝和主编《台湾文献》第20卷第2期，第156-161页。

《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讲词》，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三集《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》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-2页。

协定、合同,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,一律废止”。据此,中日过去所订的条约当然废弃,《马关条约》对台湾的束缚完全消失。1943年11月26日,蒋介石在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、英国首相邱吉尔共同签署了《开罗宣言》,明确表示三国之宗旨“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,例如东北四省、台湾、澎湖群岛等,归还中华民国”。围绕收复台湾,国民政府的下属机构及社会团体、组织等对日据下台湾展开细致的研究,兹分述如下:

(一)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

1943年5月,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完成了《战后台湾问题》的研究报告,论证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“所以,战后台湾的地位,其领土与主权,必须归还中国,我们在战后处置台湾,亦应以‘收复失地’为标识。根据历史,台湾早系我领土,战后自应归还我国,根据国际公法来讲,马关条约载明‘永远让与日本’字样,而自宣战后,其条约自归失效,台湾在战后自应归还中国。根据上述,我们反对国际共管台湾,要求领土与主权的先属然后谈设防”。

《开罗宣言》发表后,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。1944年3月,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处向蒋介石拟具收复台湾准备工作事项,提出:“调查日寇过去统治台湾之方式及其有关法律与番民

《国民政府对日宣战》,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三集《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》,第3页。

陈志奇编:《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》之《开罗会议经过》,台湾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,第6037页。

《战后台湾问题》,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三集《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》,第100页。

实情以为拟订将来我国订定治理台湾之各种单行规章之参考”。4月17日,国民政府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(下简称“台调会”),作为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,任命行政院秘书长兼全国总动员会议主任陈仪为主任委员。

台调会的主要任务是:搜集有关台湾资料;调查台湾实际状况;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;编辑有关台湾的资料刊物。除任用中央设计局所属人员外,还聘用各相关单位的人员,如外交部、财政部、国际问题研究所等,以及台籍人士和专家,如李友邦、谢南光、李万居、黄朝琴、丘念台等台籍人士为委员或兼任专门委员。台调会成立之初,各项资料极为缺乏,而“实地调查因交通太不便,无从着手”。在成立的第一次委员会议上,台调会就重点讨论了搜集资料的方案。之后,发动了广泛的渠道进行搜集。

经过艰苦的努力,台调会分类翻译台湾法令,编辑台湾概况,出版有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》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教育》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交通》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财政》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社会事业》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卫生》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户政概要》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贸易》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警察制度》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专卖事业》《日本统治下的金融》《台湾地方行政制度法规》《台湾财务法令选辑》,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工业、糖业、电气煤气及自来水、农业、水产、林业、矿业、水利等资料,约150万字,均交中央训练团印发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参考。还“绘制了五万分之一琉球地图、十万分之一及一百万分之一台湾地图。其中琉球部分已晒出交军令部。台湾部分一百万分之一地图一种业已出版”。盟军对台湾军事、工业等设施的轰炸,也设

《行政院秘书处呈蒋介石电》,陈鸣钟、陈兴唐主编:《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》(上),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,第2页。

法作了详细的统计。

在广事搜集、整理资料的同时,从1944年5月中旬开始,台调会着手起草《台湾接管计划纲要》,反复斟酌,拟就《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草案》,于1945年3月经蒋介石核准签发,正式公布了《台湾接管计划纲要》。又制定《台湾地政接管计划草案》《台湾金融接管计划草案》《台湾警政接管计划草案》《台湾教育接管计划草案》,作为该纲要的试行细则。

通过研讨,台调会认为,如何处理台湾的行政区划、土地问题、公营事业最为重要。1945年2月,台湾土地问题研究会成立。成员除台调会人员外,还包括地政署、中央设计局土地组人员和立法委员。到5月,共召开12次会议,讨论台湾土地现状,完成《台湾土地问题研究会报告书》,依据国民政府政策和台湾接管计划拟定了具体实行方案。

1945年2月,成立台湾行政区划(域)研究会。到4月,共举行4次会议,讨论行政区划各项问题,如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”、“乡镇区域之划分”、“台湾保甲制度”、“县市区域之划分”,研讨省政府、县市政府与乡镇保甲的组织及各级民意机关的设立问题。5月,完成《台湾行政区划(域)研究会报告书》,拟定新的台湾市县名称和划分。

1945年3月,台调会成立台湾公营事业研究会,负责研究台湾接管后的公营事业的管理和发展。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,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经济体系,生产力的整体水平高

《台调会三十三年度工作报告》《台调会工作大事记》等,陈鸣钟、陈兴唐主编《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》(上),第3-11页。

陈鸣钟、陈兴唐主编《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》(上),第49-57、124-132页。
同上书,第67-72页。

同上书,第115-123页。

于大陆各省。陈仪主张，“台湾在日人统治之下已是资本主义化，但我们收复后，对于一切产业必须国有或公营”。

收复台湾后应实行何种行政体制，台调会及当时在重庆的台籍人士多主张采用不同于各省、而类似于日本在台总督府的行政体制，也有人主张“全盘改变日本统治时的制度，建立省政府，推行当时通行的一切法令规章”，但陈仪等人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。《台湾接管计划纲要》规定：“接管后之省政府，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以较大之权力。”到了8月，陈仪又向蒋介石提出不在台湾建立省政府，而设行政长官公署，作为过渡机构，蒋介石予以首肯。9月4日，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》公布，规定：“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，于其职权范围内，行发布署令，并得制定台湾省单行规章。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，受中央之委任得办理中央行政。台湾省行政长官，对于台湾省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。”

(二) 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的研究成果

1941年2月，在大陆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台籍志士，在重庆联合组成台湾革命同盟会。为了促使大陆同胞注意台湾问题，掀起复台运动的宣传。1942年初，在该会的策划下，获得重庆国际文化界和报界等17个团体的热烈支持，定同年4月5日为“台湾日”，发起规复台湾的宣传浪潮。本着“宣传先于组织”的设计，于1943年4月创刊《新台湾》杂志，编撰“台湾问题丛书”，有系统的介绍台湾的历史与地位，启发为收复台湾而奋斗的决心，以扩

《台调会会议纪录》，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四集《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》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41页。

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》，陈鸣钟、陈兴唐主编《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》(上)，第113-114页。

大宣传。1943年国民党中央成立直属台湾党部。台湾党部编印《台湾问题参考资料》，参与台湾光复的舆论宣传等等。

1943年11月，翁俊明撰《改造台胞国民性之意见》，认为“台胞的优点在于勤勉耐劳，富于冒险精神，他们有不畏艰难，披荆斩棘，开拓新天地的勇敢精神，所以个人孤力奋斗之能力极强。他们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勤俭刻苦，安份守己，与人互以有利共处，不相侵犯，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下，其个人事业之成就，殊是令人惊叹与佩服”；其缺点是“缺乏组织能力”、“缺乏服从精神”、“缺少礼节”、“轻生前重死后”、“易迷信多疑惑”。主张从言语、中华礼教、传统道德伦理、团体训练等方面加以改造。

李友邦著《台湾革命运动》，收录其抗战以来的讲话稿15篇，“认为祖国抗战与台湾革命已是不可或分的”，宣传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，心向祖国，论述了中国抗战与台湾革命的关系、收复台湾的意义与重要性及台湾建省的必要性。

1944年6月，黄朝琴撰《台湾收回后之设计》，内容包括：台湾之收回与外交问题，军事之部署、人事、日人之去留及其财产之处分问题，行政机构、警察制度、财政、货币制度、专卖事业、国营糖业、台湾之资源与工业化问题，教育问题。作者就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，特别评述日据下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等，尔后提出接收时可具操作的方案，对陈仪的影响较大。

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三集《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》，第1-5页。

翁俊明：《改造台胞国民性之意见》，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三集《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》，第163-181页。

李友邦：《台湾革命运动》，福建南平总动员出版社1943年版。

黄朝琴：《台湾收回后之设计》，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二集《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》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226-265页。

1944年8月,丘念台向国民党中央呈《复台大计管见》,包括党务要纲、军务要纲、政务要纲、经济要纲、教育要纲,指出“以台治台,国人主之;主者尚德,辅者惟才,不弃其才,不扰其民。民以民意治,台可服矣。苟视为接收宝库,群起享用;用人惟亲,弃法尚情,贪污苟且,残虐其民,则民必叛而独立,而共管,势甚累卵”。提纲携领,就收复台湾的具体操作办法,列出图表,予以明示。

1943年9月,谢南光撰《台湾的民族运动》,叙述了台湾民族运动的发展历程。1944年下半年,柯台山相继撰写了《台湾收复前之准备建议》、《台湾收复当时处理提案》(治安大纲)、《台湾收复后之处理办法刍议》(政治大纲),就收复台湾提出可具操作性的建议。

1945年4月,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发刊《台湾民声报》,“拟吁请祖国人士正视台湾民众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。开罗会议后,台湾问题虽已引起国人的普遍而热烈的讨论和注意,但是大多只偏重于丰富物产的研究和调查,往往忽略台湾人民的特性和心理”。“台湾自满清统治下的所谓‘三年小叛,五年大乱’以至日本时代的数十次暴动革命,其起因都是反抗异族的统治,而欲争取其应享的自由。他们虽经日寇的残酷压迫,可是其初衷则始终未尝有所改变。这是应请国际人士加以了解和同情的”。6月,孝绍发表《试假

丘念台:《复台大计管见》,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二集《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》,第364-382页。

谢南光:《台湾的民族运动》,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三集《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》,第141-163页。

柯台山:《台湾收复前之准备建议》等,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二集《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》,第269-288页。

《台湾民声报发刊词》,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二集《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》,第291-292页。

定我是台湾人来提出三项意见》，提出：“推行‘做’的三民主义，要台湾实行地方自治，要祖国上下以留东五十年老留学生看待台湾人民。”台胞的一番肺腑之言，有感而发，语重心长，却不是陈仪等负责接收的人员所能细加体察的。

8月，“台湾重建协会”在重庆成立，该会着重探讨了台湾重建中的各项问题，出版了《台湾重建协会成立大会特刊》。在特刊上，许多人士就台湾重建中的政治、教育、财政金融、地政、工业、农业各项问题发表了看法，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。如吴健华的《论重建台湾政制之原则》、郭绍宗的《对于台湾工业建设之意见》、薛人仰的《台湾教育之重建》、陈齐昌的《台湾财政金融之重建问题》、杜振亚的《新台湾地政建设浅议》、欧阳才的《台湾农业的检讨与将来的发展》。

(三) 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

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，从1940年4月召开第一届第五次大会起，至1945年7月第四届第一次大会，均分别有数位参政员连署提出台湾复省、建军、建政、培育人才等议案，经讨论后决议送请国民政府相关单位参办。福建临时参议会于1944年4月第二届第二次大会，亦提出改善台胞生活、恢复台湾省制、培养台湾师资、迅作复台准备等议案。

1944年10月，王子毅编成《台湾》，凡6章及附录，约8万字，内容包括台湾的历史、地理、日据下的台湾、少数民族概况、台胞

孝绍：《试假定我是台湾人来提出三项意见》，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三集《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》，第264-267页。

陈鸣钟、陈兴唐主编：《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》（上），第76-113页。

秦孝仪、张瑞成编：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四集《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》，第2页。

秦孝仪、张瑞成编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》第四集《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》。

的革命运动、战后台湾问题,充分论证了台湾回归祖国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及重要意义。

1945年2月,李洁非编成《台湾》,表示:“为抛砖引玉之图,草此简编,以稔国人,使能以此小册,而引起台湾研究的风气与专著之发行,更有助于今后台湾革新的大计与建设的实施,则此编之作,为不虚已。”凡8章,约10万字,包括台湾的地理、历史、民族与人口、风物杂记、经济概况、台湾的民族精神、日据下的台湾、收复台湾对于中国的重要性。

1945年9月,福建省立南平中学开设了“认识台湾”的课程,编写《台湾之研究》的教材,约2万字,包括台湾的沿革、居民、地势、土性、交通及港湾、教育、日本统治机构、专卖、农产等。建议光复台湾后要注重教育,应在漳泉等地选择通闽南语之教师;维持行政区划的旧制;对于一些科研机构应保存。

1945年10月,陈纯仁编成《台湾》,凡8章,约6万字,主要参考了有关台湾问题的专著、论文、统计资料等编写而成,内容涉及台湾的历史、地理、当地人生活、经济资源、日据下的台湾、台湾的革命运动等,通俗易懂,为大陆军政人员赴台从事接收与建设工作提供了参考资料。

胡焕庸编著的《台湾与琉球》,叙述了台湾的地形、河川、气候、居民、农产、林产、水产、矿产、交通、贸易,附地图等,约3万字。

柯台山编著的《台湾概览》,“尽量采取现实情形及七七事变前后有关各种数字,予以分析整理,藉供研究台湾之参考及我国建设

王子毅编:《台湾》,自由出版社1944年版。

李洁非编:《台湾》,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,第2页。

福建省立南平中学编:《台湾之研究》,1945年版。

陈纯仁编:《台湾》,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45年版。

胡焕庸编著:《台湾与琉球》,京华印书馆1945年版。

台湾之借镜”，内容包括台湾的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（特别注重日据下的台湾经济），约11万字，为工具书性质的日据台湾史，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徐子为、潘公昭合著《台湾综览》，出版时取名《今日的台湾》（上下册）。1945年7月陈仪作序于前。徐子为自序：“三十二年秋，余适奉命至东南前线工作，负责规划台湾事宜，诸同志金谓向陷区收集资料或较有得，予诺之不敢忘，其后以职务关系，出入陷区，即从事收集，有所得即乞归雨潘公昭先生为译述。”该书分18篇73章370节，内容包括地理、重要城市、住民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设施、抗日革命运动、经济、产业、专卖、建设、社会、文化、诗文教育、学术等等，及附篇3章，近30万字。参考了日本大量统计资料、研究成果，材料至1944年左右，为研究日据下台湾的一部力作。

郑伯彬编著《台湾新志》。“作者从事日本战时经济之研究，常感日本殖民地状况之不明，迨开罗会议宣言台湾于战后归还祖国，乃决意先事台湾新志之写作”，根据台湾县志、闽省府所藏书档中台湾之记载、美国关于台湾之新著等，于1945年5月定稿于重庆，涉及台湾的历史、地理、气候、种族人口、产业总论、农业资源、林业、矿产、工业、交通、总论、附图及统计表，近6万字。

综观大陆围绕收复台湾的准备，翻译、编辑出版日据下台湾资料几十种之多，专著十余部，资料较全，条理清晰，阐述明确，对扩大祖国大陆同胞对台湾问题的了解与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大陆的报刊杂志对台湾问题十分关注，经常有专版予以介绍，刊登颇有广度和深度的文章。特别是台调会的研究成果，代表了当时大陆

柯台山编著：《台湾概览》，正中书局1945年版，第1页。

徐子为、潘公昭著：《今日的台湾》，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45年版，第3页。

郑伯彬编著：《台湾新志》，中华书局1945年版，第1页。

对日据下台湾研究的最高水准,为中国最终收复台湾作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,功不可没。由于处在战争状态,海峡两岸的官方与民间交流管道基本上中断,大陆同胞已很难再赴台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,因此对于1937年以后,特别是皇民化时期台湾社会的变迁,缺乏切身的感受与体验,只注重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高效率一面,以致于陈仪等人决定在中国收复台湾后承袭台湾总督府的遗产,设立高度集权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,在经济上推行垄断政策、统制政策,而不顾及遭受日寇蹂躏50年之久的广大台胞的心理感受与现实利益。我们在不否认大陆对日据下台湾研究的成就的前提下,也要看到,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,极力想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,与日本对台湾大规模而富有成效的社会调查与研究相比,大陆对日据下台湾的研究仍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层次,许多结论也只停留在纸面上,拟定的一套接收方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免处处碰壁。

(褚静涛,1966年生,南京大学历史系98级博士研究生)

(责任编辑:刘兵)